

栖居与游牧

之地

Zhang Xinying Zhu

张新颖 著

文学就其小而言，是我的家，是我居住的地方和逃避之所；言其大，则是空旷辽阔生机勃勃的原野，我的感受、思想、精神在这原野上自由游牧，以水草为生。现代人已经不太知道什么是游牧了，我也不知道。但我渴望知道。过往的山河岁月，幸运的是我为自己的精神游牧找到了一片无边的草场。



凤凰 新批评文丛
总体策划：陈思和王晓明

7
学林出版社



火凤凰
新批评文丛
总体策划：陈思和王晓明

栖居与游牧

之地

Zhang Xinying Zhu

张新颖 著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113号

总体策划 陈思和 王晓明
责任编辑 李 东
扉页题字 巴 金
装帧设计 王晓阳

书 名 栖居与游牧之地(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作 者 张新颖
出 版 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文庙路120号
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 次 1994年12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3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万
国际书号 ISBN 7-80616-056-6/I·26
定 价 10.80元

火鳳凰

巴金

1945年

总 序

徐俊西

思和有一天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 he 已得到某企业家朋友的一笔赞助，准备建立基金出一套青年文艺批评家丛书，并要我写篇短序。高兴之余，只得从命。

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在“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这无论从哪一点来说，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这种真诚和抱负，都是值得尊重和赞赏的。

首先，在当前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文科学确是首当其冲的。所谓文人下海，学术消沉，大腕横行，士将不士，着实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忧虑。然而仔细一想，事情也并非果真这样糟。从大处着眼或长远一点看，经济搞上去了，文化迟早也一定会上去的。就譬如“火凤凰”这套丛书的出版，如果没有经济大潮，就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家；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家，哪有人出钱赞助出版。所以我总觉得，当前的文人学士对于刚刚出现的市场经济中那些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也不要过于大惊小怪。这里除了加强自身的修养，做到“坐怀不乱”外，还要以一种

“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宽松心态来看取繁华人生，相信在商海的沉浮中能够到达彼岸的除了物质文明之外，也必定会有人类的精神文明，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下定决心，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游过去。

其次，所谓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要言之，就是要弘扬人们在研究人文科学中长期形成的那种追求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睿智的科学态度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大家知道，从真正宏观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当今世界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实现还仍处在极不完善的初始阶段，正像恩格斯所说，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指出我们的错误一定会比我们指出前人的错误要多得多。因此对于研究人文科学的人来说，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如果没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是很难胜任的。而且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始终把自己研究的座标定位于人类价值的最终实现上，因而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要以批判的和超越的目光来审视现实，构想未来已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和理论特征。不言而喻，这种定势和特征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自知之明和社会宽容将是何等的重要和突出！别的姑且勿论，就以这套旨在“发扬上海地区文学批评优势”的丛书来说，作者们所崇尚的新批评的美学观和方法论在我国当今的文坛上究竟能获得多少知音就很难逆料，更不用说要得到其他各界人等的认同和接受了。但是不管怎样，在当前日现荒疏和浮躁的文艺批评领域里，有一群甘于寂寞的青年学子坚守岗位，不惮驰驱，并大有筚路蓝缕，继往开来的气度，这就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

以上就是我由这套丛书所引发的一点感想和议论，言不及义，是谓之序。

序

陈思和

大约是1979年春天的时候,上海作协刚恢复活动不久,成立了一个业余文学评论组,参加者主要是前几年在各个文化馆和图书馆里业余搞书评的年轻人,我那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因为缘了过去在卢湾区图书馆搞过书评的关系,也去参加过会议。记得在作协东厅会议室里满满坐了一房的人,有些相熟,有些不识,其中就有后来坚持搞小说评论的程德培。大约又过了一年,《上海文学》发表了吴亮、蔡翔等人的评论文章,在杂志的周围渐渐聚集起一批年轻的评论家。我在大学时代把主要精力放在现代文学方面的研究,很少再写有关当代的批评,不过对这些朋友们的文学活动依然是很关注的。如果今天有人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看当代文学,我觉得《上海文学》杂志所扶植的文学批评新生代,其文学观念、审美趣味以及批评语言的革新,对当时文学理论界的冲击不亚于前朦胧诗对诗歌领域、前先锋派对小说领域的革命性突破。在文革后的最初几年里,上海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有点像三十年代的海派文学,往往是开风气之先但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现象可从《伤痕》和《班主

任》、《于无声处》和《丹心谱》、《女神在行动》和《绝对信号》、《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布礼》等对应关系的效果上得到证明。但文学评论方面似乎更成功些,虽然也处于边缘地位,终能自成一翼,到1984年的杭州会议,1985年的厦门会议上,上海的青年评论家终于向文坛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风貌。

当时就有不少人议论过这个问题:上海为什么文学创作上不去,但文学评论却那么活跃。我到现在还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只有一点是大致明确的,上海本身是个开放性的移民城市,缺乏稳定的地域风格和人文历史,甚至也缺乏稳定的语言美学特征,因此在文学创作上它与那些拥有地域性审美风格的地区(如京派、晋派、湘派、陕派、川派等)相比很难取得优势。但文学理论的发展却不同些,虽然理论研究也离不开对生活的真知灼见,但更需要对人文传统的自觉归依。几十年来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绝对占有,导致了人文传统的全面萎缩。文学理论不像文学创作那样接了生活的地气,即使在政治意识形态最强大的时候,生活的民间性依然会悄悄地纠正某些偏见,展示出生活的本相,理论工作是倚仗了精神传统的发展来发展自身的,当精神传统本身处于萎缩状态,理论的自身魅力似乎很难表现出来。当时上海在全国整体的文化氛围中并不算最开放的,但上海毕竟远离政治权力斗争的中心圈,所以当北京的理论工作者正在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进行拨乱反正时,上海的年轻评论家们已经悄悄地偏离了意识形态本位的思路,朝文学本体接近。这时候“开风气之先”的城市文化特征又一次起了作用,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只有具体的现实的利害冲突之外才能慢慢的健全起来。

人文传统主要是靠古今学统来体现,但在政治意识形态把学统摧毁的情况下,人文的精神更多是靠健全的心智去感

受。《上海文学》编辑部最初从社会上发现和培养年轻的评论家是一种慧眼独具的策略，当时几位学历不高的评论家正是发挥了他们最好的竞技状态。道理很简单，学历不高不说明他们读书不多，只是表明他们接受教育不系统，但在文革刚结束不久，政治意识形态还对教育全面占领的情况下，接受教育同时也接受了一套窒息积极思维能力的教条框架，事实证明，真正靠接受教育而成熟起来的学者，其必须花费比接受教育时更多的力气来消除教育带给他的后遗症。上海的年轻评论家们在这一特殊的环境下养成了很好的批评习惯，即不但拒绝传统的意识形态侵犯，而且也拒绝各色西方流行话语的侵犯，他们在文学和理论面前，始终保持了清醒而敏感的审美触角。时至今日，他们也许在继承中外古今遗产方面做得很不够，但在意识形态和流行话语面前保持独立文学品格，融自身于文学与生活之中去发现话题，提出话题的研究风气，在全国的理论界依然是独步的。

其实，要对上海的文学评论队伍发言，还轮不到我来饶舌，但在写这篇序言前我之所以会突然冒出这些想法，纯属不按牌理出牌。因为我在通读了张新颖的文学评论集后，生出一种强烈的感情，从他的贴近文学本身、注重艺术感觉以及在评论中投入了主体对生活所保持的领悟和激情等文风特点中，看到了上海评论整体精神在他的研究文风中体现出来。事实上，上海评论界自《上海文论》时代以后，一直处在低落的状态，“批评的缺席”的呼声来自评论家深刻的自省：不但是面对了至今盛行依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西方流行话语，而且还遭遇了新兴的商品大潮下庸俗炒卖的新闻风气。但这只是现象的一面；从另一面看，近十年来上海高校在一种相对自由活跃的人文空气下渐渐地培养出一批新的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上海老一代的学者始终坚持了一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潇洒风格，让学生在接收中外文学传统教育时不执于某种主义某种理论，保持了心智的健全和感觉的清醒。这次由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赞助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中所收的几种青年批评家的论文集，正是近年来上海文学评论领域涌现的成果之一。在今年春节的几天里，我读了其中三位作者的文稿，郅元宝是攻读西方美学的博士，主要研究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胡河清的博士学位虽在现代文学，但对《周易》及东方文化方面学有专长，张新颖曾是比较文学的硕士生，也是兼备了东西方文学的知识修养。但他们除了自己的专业以外，都对当代文学情有独钟，写出了一篇篇引人注目的评论文章。我觉得热爱当代文学不仅仅是一种纯粹个人的爱好，而体现了这个时代对年轻人的有力感召。他们都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学院里自鸣清高的学者，而是热爱当代生活，愿意自己的知识才华参与当代文化的建设。尽管他们将各自的知识背景融入研究对象时不一定做得很圆满，如元宝为文失之晦涩，河清研究偏于虚玄，但他们决没有学了东方或西方的一知半解而炫耀、而标榜的习气，各人走各人的道路，各人说各人的块垒，形成一个文学的多声部合唱，这样才能创造出文学批评的真正繁荣。

说到张新颖，我可能有更多的话可说。1989年我第一次协助贾植芳教授指导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只收了他一个学生。虽是与贾先生合带，而且主要是先生指导的，但在我个人为硕士生导师的履历里，他算头一个，我多少总有点珍惜这份缘分。新颖个头不大，性格内向，初接触时让人觉得他有些怯懦，只有接触久了才了解他治学的聪明和为人的方正，其实在年轻学子中并不缺乏聪明而方正的人，但张新颖除了聪明而

绝不油滑，方正绝不张扬外，其性格中还有一种非常有利于成为学者的特点，即沉静。有一件事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研究生临近毕业的时候，分配问题遇到了些麻烦，本来安排留校的事突然发生变卦，令人一时难以接受。我那时身为他的导师，自然对他未来的事业前途负有责任，于是到处托人说项，幸好《文汇报》有关领导出于爱才，同意他进了报社当记者。但就在这段时间里，新颖既没有急得一筹莫展，惶惶不可终日；也没有上下奔走，去找关系走门路，而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寝室里，写出了一篇很漂亮的评论史铁生的文章《平常心与非常心》。在文章里他议论了人应该怎样面对困境和命运，讲的全是史铁生的创作，清朗明白。此文在《上海文学》上刊出后很受好评，但知情者如我，深知他在文字背后的寄托。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学工作者，他的才能并不仅仅表现在他是否能敏感生活，也不仅仅在于他能否把这种感受表达出来，以上这些才能是任何一个做文字工作的人都应该做到的，而唯有文学家才能把对生活的感受通过沉静的过滤，转化为审美的艺术的形态表达出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这个意义上才是完美的。从这件事后，我以为新颖只要坚持在学术的道路上走下去，前途当会有较大的发展。

新颖为自己的第一本评论集取名《栖居与游牧之地》，并作解释说：“文学就其小而言，是我的家，是我居住的地方和逃避之所；言其大，则是空旷辽阔生机勃勃的原野，我的感受、思想、精神在这原野上自由游牧，以水草为生。”这种个人与文学的关系鲜明地表示了他们这一代青年文学工作者的精神特征。与上几代文学家们把文学看作是表达思想或者宣泄感情的工具不同，文学在这一代人手中不再是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渠道，而变成逃避世界，使内心有所寄托的场地。在这一点

上，新颖的比喻似乎有更大的涵盖意义。在这几位年轻评论家的文集里，尽管对批评对象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其关注的视点几乎一致，都集中在当代先锋性或者民间性的作家身上。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一代文学自有一代发言者和解释者，这些年轻的评论家有着自觉的文化层次认同感。郗元宝在他的论文集后记中明确地把先锋作家引为自己的同层人，把自己的困惑与先锋作家的创作特征联系起来加以阐释。在新颖的一篇题为《我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文章里，他通篇使用复数第一人称，在文章的最后三段文字里，几乎每一个简单句里都反复出现了“我们”这个词。这种宣言式的文体里，抒发了强烈的“代”的意识：文学在这一代人手里不再是表达的工具，因而它的鲜明性往往被更为含混的意义所覆盖。因此，似乎不能指望在这些评论文章里读到过于明确的意义，但我们从这些富有感受性的文字里不难理解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困惑、绝望及其反抗。

平心而论，新颖的文章是比较容易沟通的，原因就在他善于把自己的感情不加掩饰地寄托在评论文字中间。我喜欢读他的文章的原因主要也在这里，从他的文章里可以读到原来上海评论家们惯有的风格：感性、贴切、没有任何外在的理论障碍，一下子就沟通了评论主体和评论对象之间的交流。他有两篇评论张炜的文章，也许因为同是山东农村的孩子，他读张炜关于在田野上奔跑的描写时，激动得使用了“复活”这样庄严神圣的词。他如诗如歌地分析着作家的创作：

对于张炜来说，对生生不息的东西视而不见要比深切感受它更加困难，也许在一段时间里，世俗尘物遮蔽了张炜的深切感受，但生生不息的东西是不会被永远遮蔽的，它自己就会动起来，帮助张炜抖掉

身上的遮蔽之物,牵引他返回他生长的大地,而只要融入这片亘古的土地,顺从自然和天性敞开心扉,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生生不息就会立刻在个体之我的身上强烈地涌动。这时他敏悟到:大地的本质或生生不息事物的最深、最根本的内里都不是一个硬核,而是一个绵长不绝的流程,并且要流到自我的身上,还要通过自我流传下去。生生不息肯定不是孤立的个体的特征,它归从于一个比我更大更长的流程。让生生不息之流从自我身上通过,也即意味着自我的消融和归从,我不再彰显,因为我在自己的家里,我与最深的根基恢复了最亲密的联系。

这种评论文字已经很难再区分其哪些是客观理性的分析,哪些是主体的自我体验,我想这类精彩的评论文字本身或许就是一种创作,一种诗。只有当评论主体读作品如同读生活,完全沉浸在对生活的感受里,才能达到这种主客体亲密无间的抒情。新颖的评论文章或许最不具理论色彩和知性特征,但它们都充沛了这样一种精灵般的魅力。

本书另有一集是关于台湾香港文学的研究,也是相当有特色的。新颖在读研究生期间主攻中外文学关系。他做的学位论文题目,是我指定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台湾文学的影响。这题目的难度很高,且不说资料搜集困难,还需要有特别敏感的体验,方能把握住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域环境下的文学现象。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的台港文学研究处于盲目的状态,先是哄美籍华人作家,后又炒台港通俗作家,似乎拣到篮里就是菜,很少有文学史家的眼光。如果真要研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台湾文学的影响,就必须从头做起,追根寻源,这是非常困难的事,连台湾的学术界也无人做过。我曾

经想系统研究这个题目，并在香港搜集过一些有关资料，但后来稍稍研究了一二个作家（如王尚义、吉诤等），就知难而退了。现在我把这个难题，同时又是我的心愿留给了新颖，他却很认真地接受了下来。那篇关于《文学杂志》的论文，就是这个题目的一部分，他从研究夏济安入手，引出一份杂志的特色与一种思潮的形成。这种由细部入手，再展示宏观的研究方法，不但表示了对研究资料的尊重，也保持了研究者丰富而健全的艺术感性。较之有些年轻学者生吞活剥了一些理论来自我炫耀，更显出了做人为文的诚实风范。本来在研究了《文学杂志》以后，新颖将继续研究《现代文学》杂志的，本集中几篇关于台湾作家的专论，就是为这个题目所作的准备。可惜时间苦短，他很快就毕业了，走上了记者的工作岗位，新的环境使他的研究一度停顿下来。我不知道他究竟何时能真正完成这个课题的研究工作，但我是认真地期待着。

拉拉扯扯，不觉已占了不少的篇幅，本来对新颖的文章还应该多谈些的，包括对其存在的不足，但作为一篇序再长下去未免有点喧宾夺主的嫌疑，暂且打住不妨。不过有一点题外的话还是想说，《“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现在只编了第一辑，虽说是以鼓励青年评论家为主要方针，但也不想仅限于此，希望第二、第三辑陆续编下去，为耕耘我们自己的园地，作出我们一份努力。

1994年2月19日写于黑水斋

目 录

1	序	陈思和
1	第一辑 当代文化感言	
3	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	
	——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	
22	世纪末的尴尬：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27	存在的难题：我们如何表达自己	
35	第二辑 当代文学批评	
37	新空间：中国先锋小说家接受博尔赫斯启悟	
	的意义	
51	观感传达方式的历史沟通	
	——谈马原兼及其他	
62	恐惧和恐惧价值的消解	
	——残雪小说论	
69	荒谬、困境及无效克服	
	——余华小说试评	
75	“弥漫性文本”及其他	
	——理解吕新	
85	平常心与非常心	
	——史铁生论	
96	大地守夜人	
	——张炜论	

111	不绝长流 ——再说张炜言及张承志
117	一条绳索系两端 ——王朔《我是你爸爸》分析
125	乱语讲史 俗眼看世 ——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的元意义世界
134	坚硬的河岸流动的水 ——《纪实和虚构》与王安忆写作的理想
147	第三辑 隔海文谈
149	论台湾《文学杂志》对西方现代主义的介绍
179	现代精神的成长：从感悟到抗拒 ——对王文兴小说创作主题的一种贯通
199	从焦虑开始 ——欧阳子小说简论
205	灵视之域 ——罗门的诗和诗论
220	读台湾新世代小说札记
247	第四辑 阅读漫语
249	倾城情谐未 盛世人飞灰 ——两个香港故事的参照阅读笔记
260	张看，看张 ——张爱玲小解三题
279	无辜的石头：话语权利和解构功能 ——读西西小说《致西绪福斯》
285	后记

第 一 辑

当代文化感言

对当代文化的关切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对象化的认识活动，身处其中的情境使言说者的叙述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自我省思的性质。把长期萦绕不去的问题描述出来，说出来，虽然不一定妥贴，但还是有一吐为快的感觉。